

从突厥内徙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

张 雄

在唐太宗统一全国的宏伟事业中,妥善处理北疆的突厥问题,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唐太宗在逐个消灭中原割据势力的同时,对突厥采取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,解决了唐初的突厥问题,从而安定了北部边疆,进一步促进了突厥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,发展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。

突厥是我国古代匈奴族的别支,北魏时附于柔然,北齐、北周同突厥已有密切的关系。隋初,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,文帝杨坚采用长孙晟的建议,曾先后同东突厥的摄图、雍虞闾部和突利、染干部建立过和好的关系。至隋末,由于连年战乱,社会动荡不安,不少中原人民徙往北疆,投奔突厥,一时“归之甚众,又更强盛”。^①在中原地区割据称雄的薛举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王世充、李轨、高开道等,对突厥俱“北面称臣,受其可汗之号”。^②居住在我国边疆的各族,东至契丹,西尽吐谷浑、高昌,北及铁勒各部,都附于突厥。但是,由于突厥社会还处在“迁徙无常,而各有地分”^③的游牧经济阶段,依靠的是“控弦百余万”的军事组织,因而这种强大是不稳固的。

李渊父子初至太原密谋起事时,就把同突厥维持和好,作为实现“经邦济时”计划的基本方针之一,^④派刘文静赴突厥,建立了良好关系。在李渊父子进军长安、师趋霍邑、兵逼潼关的几次重要作战行动中,都得到了突厥的支持和配合,使李渊父子无后顾之忧,顺利入关,得以“据蒲津而屯永丰,阻崤函而临伊、洛”,^⑤为平定中原打下了巩固的基础。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看,突厥对于李渊父子的统一事业,实际上给予了支持。也正因为这样,尽管后来突厥贵族一再骚扰中原,唐太宗也还始终同它维持了某种形式的盟约关系。

当李渊父子兵定关中、废隋帝侑、公开举起大唐的旗帜、开始统一全国的事业之后,突厥贵族对唐政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隋开皇末年,文帝杨坚以义成公主嫁突厥启民可汗(染干)。启民死后,依照突厥“父兄死,子弟妻其群母及嫂”^⑥的习俗,义成公主曾先后嫁启民之子始毕、处罗、颉利为妻,干预和操纵可汗嗣立的大计。隋亡后,她遣使迎炀帝萧后及

①②③ 《通典》卷一百九十七,《突厥》上。

④ 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卷一。

⑤ 《旧唐书·李密传》

⑥ 《隋书·突厥传》

齐王之子政道于窦建德所，并立政道为隋王，“行隋正朔”，^①企图恢复隋朝统治。因此，突厥贵族不断派兵南下，并加紧勾结中原分裂割据势力，骚扰唐朝后方。武德三年刘武周败亡后，梁师都慑于唐朝的强大，遣使对处罗可汗说：“比者中原丧乱，分为数国，势均力弱，所以北附突厥。今武周既灭，唐国益大，师都甘从亡破，亦恐次及可汗。愿可汗行魏孝文之事，遣兵南侵，师都请为向导。”^②处罗听从梁师都的游说，准备从原州、延州、并州、幽州四路，分兵南下，割据黄、淮，重行魏孝文之事。但恰遇处罗身死，未能实现。后来，梁师都又亲自“往朝颉利，为陈入寇之计”，^③劝颉利乘唐朝“玄武门之变”的时机，大举进攻唐朝。因此，自武德以来，突厥贵族的骚扰渐趋频繁。尤其是武德六年唐朝统一中原后，骚扰愈烈。武德七年，颉利、突利叔侄“举国入寇”；八年，大掠朔州，袭击太原；九年，军趋武功，直逼渭水，京师长安戒严。

唐太宗在实现全国统一的斗争中，始终以主要力量打击、消灭中原割据势力，对突厥贵族的骚扰，在军事上采取守势，在政治上尽可能延续、维持和好关系。当颉利率十万大军进逼渭水北岸、严重威胁长安时，唐太宗亲赴渭水，与颉利谈判，责以背约，同时耀以军容，以示必战，迫使颉利同唐太宗于便桥立盟而退。唐太宗对突厥贵族采取的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争取政策，是为了尽可能地稳定边疆，安定中原，以便休养生息，恢复生产，习射练兵，以壮士气，准备必要时进行反击。为争取突厥贵族内部主张同唐朝和好的势力，太宗还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，孤立了大搞分裂的颉利可汗。

当时，由于颉利“法令滋彰，兵革岁动”，早已引起突厥诸部的不满。加以贞观初年，突厥之地“频年大雪，六畜多死”，而颉利“用度不给，复重敛诸部”，^④于是下不堪命，内外多叛。贞观元年，阴山以北的薛延陀、回纥、拔也古等部“相率背叛”，赶走突厥设立的欲谷设。为了进一步孤立颉利，唐太宗遣使从间道赍册书拜薛延陀部首领夷男为真珠可汗，夷男亦遣其弟向唐朝朝贡。贞观三年，是“关中丰熟”^⑤的一年，生产得到了恢复，唐王朝的统治也已稳固，朝臣大都认为剿灭颉利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主张立即发兵。唐太宗不以为然，认为应该“终示以信，不妄讨之，待其无礼，方擒取耳”。^⑥因而没有首先破坏盟约，采取军事行动。贞观二年，太宗对“势危援孤”的梁师都发起了最后攻势。颉利又一次违约，遣兵来援梁师都。唐太宗当机立断，派兵击破颉利的援军，消灭了梁师都，荡平了中原地区最后一股割据势力。三年，令兵部尚书李靖率大军五路讨伐颉利，十二月，突利可汗及郁射设、荫柁特勤等率所部来投。四年初，李靖袭定襄，俘炆帝萧后和隋主政道，杀隋义成公主，彻底消灭了隋朝残余势力，颉利败逃。阿史那苏尼失“遂举其众归国”，^⑦其子阿史那忠生擒颉利，以献唐朝，突厥广大部众纷纷内徙“归国”。唐朝“遂复定襄、常安之地，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”，^⑧北部边疆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，直到开元中这大约一百年间，北疆没有发生大的动乱。

① 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

②③ 《旧唐书·梁师都传》

④ 《通典》卷一百九十七，《突厥》上。

⑤ 《贞观政要》卷一，《政体》。

⑥ 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

⑦ 《旧唐书·阿史那社尔传》

⑧ 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

二

对于大量内徙“归国”的突厥部众及其首领，如何妥善安置和处理，这是唐初处理民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。这个问题处理的正确与否，不仅涉及到唐朝中央政权与突厥族的关系，而且会直接影响边疆各族对唐王朝的态度。为了处之以慎，善于纳谏的唐太宗，召集群臣“议安边之术”，讨论处理突厥和安定边疆的政策及办法。

长期以来，在汉族封建统治阶级中，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^①的大汉族主义思想，始终占统治地位，唐朝统治者也不例外。而且，由于突厥贵族从周、隋以来，“世寇”中原，威胁着中央王朝的统治，因此，大多数朝臣，对内徙的突厥族采取敌视态度，主张“分其种落，俘之河南兖、豫之地，散居州县，各使耕织”，^②“变其风俗。百万胡虏，可得化而为汉”，^③实行民族同化政策。那就是拆散突厥部落，迁其部众于汉族发达地区，分散于各州县治理，改变其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。他们认为实行这种“化而为汉”的政策，既可使唐朝获“加户之利”，又可使多事的塞北成为“常空”^④的安全地带。这种短浅偏颇之见，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。民族，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人们的稳定共同体，各有自己的经济生活、语言、习俗，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内，各民族的融合，只能是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自然结果，决不是依靠政权力量，用行政命令强制同化的结果。那种不承认民族特点的民族同化政策，只会挑起民族纠纷，破坏国家的统一，其所造成的恶果，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。在大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，如果实行这种政策，不仅不能妥善解决突厥内徙问题，而且会引起边疆各族的不满，破坏大唐统一、安定的政治局面。因此，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意见。

以魏征、杜楚客为代表的另外一些朝臣，在对待突厥的基本态度方面，与前者没有区别。在具体作法上，主张“遣发河北，居其旧土”。^⑤他们认为，突厥“非我族类”，其心必异，“居我肘腋，甫迹王畿，心腹之疾，将为后患”，^⑥坚决反对突厥族的内徙。他们十分推崇晋代江统的“徙戎”主张，认为晋武帝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议，把居于近郡的氐羌逐出塞外，因而“数年之后，遂倾瀍洛”。^⑦把晋末以来“四夷乱华”的原因，完全归咎于各少数民族的内徙，不加区别地反对历史上的一切民族迁徙，看不到民族迁徙带来的民族大融合，是历史上的进步现象。他们实际上重复江统的主张，让已经迁徙、趋于融合的民族“各附本种，反其旧土”，要中原的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“正朔不加”，“惟以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”，^⑧只有这样，才可相安无事，“所害不广”。这是一种从狭隘种族主义出发的消极防范政策。唐太宗在许多重大问题上，对魏征是言听计从的，但在处理突厥内徙、确定民族政策方面，却没有采纳他的“切谏”。

对于内徙的突厥部众，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仿“汉建武时，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”^⑨的办法，把他们置于河南朔方之地，（今内蒙南部经山西北至河北北部）“全其部落，得为捍

①⑧ 《晋书·江统传》

② 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

③④ 《旧唐书·温大雅传》

⑤⑥⑦⑨ 《贞观政要》卷九，《安边》。

蔽，又不离其土俗，因而抚之”。^①所谓“全其部落”，就是要保全和不改变突厥族现有的社会结构，任用本民族的“酋首”进行治理；所说的“不离其土俗”，就是不改变突厥族现存的生产方式、风俗习惯，正视其民族特点。温彦博的这种“安抚”政策，实际上是给予突厥族以某种程度的“自治”，它比“分其种落”、“变其风俗”的民族同化政策，无疑是较为开明和进步的。这种主张，实际上也反映了突厥人民和中原人民日益接近、逐渐融合的历史趋势。北魏以来，突厥和中原的交往日趋频繁。隋开皇年间，突厥都蓝可汗（雍虞闾）请“缘边置市，与中原贸易”，^②得到隋文帝的允许，突厥人与汉人的经济交流更为活跃。后来，突厥启民可汗接受隋朝的册封，其部众内徙，夏州（今陕西横山）、胜州（今内蒙古伊盟东北）之间，“尽为启民畜牧之地”。^③马邑（今山西朔县）成为各族人民互市的集散点。隋末，由于连年战乱，中原人民不断迁往突厥，随着唐朝的日益强盛，各族人民也相继内徙。因此，到唐初，各族人民交往日深。当然，温彦博主张的这种民族的“自治”是十分有限的，他提出要在各部落“选其酋首，遣居宿卫”，^④接受唐王朝的直接控制；对其部众，要“教以礼法”，^⑤加强思想控制。总之，对突厥既要羁縻治之，又要使它起到“捍蔽”北疆的作用。

经过一场关于“安边之术”的大辩论，因“朝士多同彦博议”，^⑥唐太宗采用了温彦博的意见，于朔方之地，从幽州（今北京市）至灵州（今甘肃灵武南），设置顺、祐、化、长四州都督府，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，左置定襄（今山西平鲁）都督府，右置云中（今山西大同）都督府，任其本族首领为都督。按唐制，“都督掌督诸州兵马、甲械、城隍、粮廩，总判府事”，^⑦比一般州官有较大的权力。突厥首领，分别得到任用和安置。封那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、右武侯大将军、化州都督，并赐姓李氏，令统颉利旧部；封那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、右卫大将军、北宁州都督；封突利可汗为北平郡王、右卫大将军，以其下兵众置顺州都督府，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。^⑧唐太宗特地向突利指出：“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，正为启民前事故也”，说明“改变前法”，不立可汗、不复其国，是为了维护统一和安定。就是对颉利可汗也采取了宽恕政策，“诏还家口，馆于太仆”，“廩食”养之。唐太宗向他指出：“论尔罪状，诚为不小，但自渭水曾面为盟，从此以来，未有深犯，所以录此，不相责耳”。^⑨后来授颉利朔州刺史、右卫大将军，赐以田宅，他死后，依突厥俗礼而葬之。突厥各部首领凡来者，皆拜为将军、中郎将等官，他们“布列朝庭，五品以上百余人”，^⑩几乎占唐廷朝士的一半。“酋长并带刀宿卫，部落皆袭衣冠”，^⑪唐王朝已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政权。

由于唐太宗对内徙的突厥人，“从其所欲”，“任情居住”，^⑫因而进入长安居住的突

①④⑤ 《贞观政要》卷九，《安边》。

②③ 《隋书·突厥传》

⑥ 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三。

⑦ 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

⑧ 《通典》卷一百九十七，《突厥》上。

⑨⑩ 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

⑪ 《贞观政要》卷一，《政体》。

⑫ 《贞观政要》卷九，《安边》。

厥人接近万家。唐太宗对“诸蕃”娶“汉妇”不加禁止，^①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和好相处和自然融合。《大唐新语》曾经记载了当时京城坊市“蕃”、汉杂居，“蕃着汉帽、汉着蕃帽”的情况。就连大唐的太子承乾也引突厥“群竖”入宫玩耍。这种各族杂居、和好相处的盛况，在汉族统治阶级执掌中央政权的各个朝代中，的确是罕有的。正如宋人洪迈所指出的那样：“夷狄之臣”来中原者，“唐世尤多”，^②而这种盛况的开拓者无疑是唐太宗。

三

唐王朝对内徙的突厥的妥善处理，加强了中原人民同西北各族人民的联系，极大地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，结束了各族并立、群龙无首的局面。贞观四年三月，西域、北部边疆各族君长纷纷诣阙，请尊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大首领——“天可汗”。作为汉族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的唐太宗，并没有以“大唐天子”“下行可汗事”为耻，而是乐于接受了各族君长的请求，“乃下制，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，皆称皇帝天可汗，诸蕃渠帅有死亡者，必下诏册，立其后嗣焉”。^③从此，正式确立了对边疆各族首领册立的册封制度，大唐成为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宋人王溥对确立册封制度，曾给予高度评价，并认为唐朝“帅统四夷，自兹始也”。^④

唐太宗晚年，以为“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，不能服戎狄，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”，^⑤把解决边疆民族问题作为自己一生事业中成功的主要之点。的确，他曾经为突厥问题而“坐不安席”，^⑥为“边鄙无虞”^⑦而无比欣喜。他批评隋炀帝“专信邪道，大忌胡人”，^⑧摒弃了炀帝那种假作互市、诱杀胡悉^⑨的冒险政策，摆脱了“夷狄者，同夫禽兽”、“不可以仁义教”的陈腐观念，认为“仁爱之性，岂隔华夷”。^⑩在处理政务中，他不太歧视少数民族，实行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。对内徙的少数民族，不强制同化，不消极防范，全其部落，保其土俗，用本族首领管理，任他们做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，不封可汗，不复其国，使其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一部分。尽管唐朝边疆各族情况不同，“内属”的背景和形式也不一样，但唐太宗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一政策，如对岭南“酋帅”冯盎，西域的高昌，大漠的薛延陀等，大致上都是如此。

唐太宗在总结处理民族问题成功的原因时，认为自己与古人不同，对华、“夷”“独爱之如一”。^⑪当然，这样“如一”，并不是什么民族平等。他的政策的基点，是从维护唐朝统一的封建国家出发的，是从统治阶级的“恩抚”观念出发的，因此不可能真正摆脱大汉族

（下转43页）

①③ 《唐会要》卷一百。

② 《容斋随笔》卷十一。

④ 《唐会要》卷七十三。

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八，《唐纪》十四。

⑥ 《贞观政要》卷二，《任贤》。

⑦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六，《唐纪》十二。

⑧ 《贞观政要》卷六，《慎所好》。

⑨ 《隋书·裴矩传》。

⑩ 《贞观政要》卷五，《孝友》。

⑪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八，《唐纪》十四。

四、结 论

历史上,氏族曾经建立了仇池、前秦、后凉等割据政权,关于氏族活动和他们的风俗习惯,在历史文献中不乏记载,尽管时断时续,但历代记载的史料中,都或多或少能找到一点氏族在这一带活动的根据。明清以来,地方志中关于白马人的记载颇多,但民族名称已不是“氐”,而称“番”了。“番”是汉族对这一带少数民族的统称,当然,其中也包括氏族在内。历史在前进,由于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,在历史的进程中,各民族互相同化、融合,民族的特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一些变化。由于白马人居住地区处于汉藏两个民族的中间地带,山高林密,交通闭塞,地势险峻,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,是历次历史大动荡中的相对静止地区,社会发展比较缓慢。正因为这些原因,以致我们现在还能在这一地区找到史籍记载的关于氏族的许多线索,而其中有的特点,竟和史书记载十分相似,使我们感到,在区别了汉族和藏族对他们的影响以后,剩下的特点和史书上讲的氏族特点是那样的一致。

另外,必须指出的是,历史上记载氏族的一些特点,大多是关于仇池一带氏族的描写,当时武都以北的仇池也是氏族活动的中心,目前仇池山所在的西和县及其相邻地区,尽管离目前白马人分布地区只有几十公里到一百多公里,但这些县已没有白马人分布,这是因为“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,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”的结果。在分析了史籍记载,与白马人目前所保留的特点进行对比研究以后,促使我们下这样的结论:白马人就是历史上一支氏族的后裔,而最大的可能是白马氏的后裔。

(上接48页)

主义的羁绊。尤其是贞观十三年发生阿史那结社率“夜犯御营”的事件以后,太宗竟同意魏征“遣发河北”的主张,一度将突厥徙出塞外。在他的晚年,由于战争频繁,他不断遣发边疆民族出征,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。但从总的方面来看,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。唐太宗死后,“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,闻丧皆恸哭,翦发、髻面、割耳,流血洒地”。“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”;^①吐蕃弃宗弄赞也特地上书效忠唐朝。这些情况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成功。

四百多年以后,宋人范祖禹在撰写《唐鉴》、总结前代历史教训时,曾经责难唐太宗“以万乘之主,而兼为夷狄之君,不耻其名,而受其佞”。认为唐太宗如此处理民族问题,是“欲冠带四夷,以夸示天下”,所以“事不师古,不足为后世法也”。这种评说,出于北宋时代的范祖禹,虽然不足为怪,但是,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,范祖禹对唐太宗的责难,显然是不公正的。历史证明,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中,没有拘泥于重诸夏、轻“夷狄”的传统观念,在中国封建社会中,执行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政策,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的发展和巩固,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九,《唐纪》十五。